

曾国藩官场绝学

肆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曾国藩官场绝学之四

曾国藩心经

主编 林之满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

A1002192

目 录

卷一 治心篇 (1)

释迦牟尼说：世间一切万物，“壮无过心”。所谓治心，也就是孟子所说的“苦其心志”“曾益其所不能”的功夫，是“天将降大任”前的首门功课。李鸿章说，我老师之有成，乃善治心也。蒋介石称“曾国藩治心之言，皆阅历之语”。毛泽东说，欲动天下者，先动天下之心。心无定旨，人如浮萍，终将无成。曾国藩积数十年之曲折，独创治心之法，先去其毒，阳毒为忿，阴恶为欲。又详述身心兼治、口体并防之十四个妙方。

卷二 养心篇 (10)

“问君何能尔？心远地自偏。”心的宁静排却了自然的哗喧。曾国藩早年病弱缠身，成名后“游心于老庄之虚静”。平生以“咬得菜根百事可做，世味淡薄，身心无累”为法，终身以“不药（不服补药）”自诩，参以家法，独创养心十四条，日日磨炼，三十年后身体如常。平生服膺苏东坡，欲步其后尘，修炼瑜珈术。对吕坤所说“置富贵、贫贱、死生、常变于度外，是养心第一法”玩味尤久。

卷三 暇心篇 (45)

暇心者，李渔称为“闲情偶寄”，林语堂称为

“生活的艺术”。仕途万事缠身，戎旅胜负难定，陶朱锱铢日较。曾国藩说古今能胜大任者，都是身心疲劳之人，因此必有暇心用来调适。苏东坡寄情诗文，西门庆征逐女色，高雅低俗足见他日成败。曾国藩说，暇心游离于本业之外，又关系到事业兴衰，故暇心之寄要厚植根本，积功累行，方有枝繁叶茂，花团锦簇之来日。胡林翼少时喜“冶游”（嫖娼之异名），担大任，顿改前非，时人称他“晚年进德之猛，卒以立功名”。

卷四 诚心篇 (73)

曾国藩说，古今英雄“立得住”，如同先有根据的后能打天下一样，必须有诚心实意。荀子说，养心莫善于诚。诚就是不欺。今人讲：信义春常在，心诚则灵。程门立雪、三顾茅庐都深蕴一个诚字。曾国藩以忠诚为天下倡，选将练兵以诚为先，平生不蹈大言，不喜驾空之事，手订“敬、静、纯、淡”诚字四法，终使他群雄影从、“勘平大乱”，功、德、言三并不朽。

卷五 殚心篇 (97)

殚心者，全力以赴、鞠躬尽瘁之意也。曾国藩说，人始初奋搏，如初飞之鸟，很有孜孜向上的意境，但功成名就之日，反凭添许多息肩之念，实则进一步高山仰止，退一寸草木皆兵。王安石为相，张居正变法，有殚心而无余勇，皆旋踵而败。胡林翼与楚疆共生死，乃有天心大转。纵横家王闿运说：曾国藩实以殚心苦战而成功，读其文集，催人泪下。“马不加鞭自奋蹄”，曾国藩权位越高，责任感越强，平生以

“拚命报国，侧身修行”八字为“坚守之地”。

卷六 名利篇 (119)

《菜根谭》曰：名为招祸之本，利乃忘志之媒。“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”，豪杰难过名利关。古往今来，有的人好虚名以殒身，有的人贪私利以祸族。面对名利，心将何置？明代陈继儒说“透得名利关，方是小休息”。曾国藩以“不恃不求”淡处名利。他关于“名利”的五条秘笈，读来颇能启人心智。

卷七 成败篇 (145)

“成者王侯，败者贼”是否就是评论人生的盖棺定论？月中则昃，人满天概，盛衰成败岂无凭！曾国藩取法庄子“美成在久”，深得铢积寸累的功夫。刘邦败而犹胜，曹操成犹是败。曾国藩不求完美，跳出成败，信守“波平浪静处安身”，以“掀天盖地”为成败大忌，说自己“阅历万变”，才悟出成败的四项原则。

卷八 祸福篇 (165)

“祸者福所依，福者祸所伏”。趋福避祸乃人伦之常。曾国藩说：“人生福境祸区，皆念想造成”，“念头稍异，境界顿殊”。他总结出“骗、暗、诡”乃取祸之三端，而“诚、明、仁”乃避祸之三招。“鸿福齐天”固然美好，然而，过满则溢，物极必反。难怪连孔圣人都喟然长叹：“唉！哪有满了不翻倒的呢？”且看曾国藩对《小窗幽记》和《菜根谭》的诠释。

卷九 得失篇 (191)

《小窗幽记》曰：胸有灵丹，点化得失。得失乃人生第一关口，“看透得失方是大英雄”。曾国藩引古人之言说：“非分之福，无故之祸，非造物之钓饵，即人世之机阱”。为公事，为国家，得失必争；为个人，为名利，得失当淡。曾国藩用“悔”字诀和“硬”字功善处得失，一生奉守“六句箴言”。

卷十 进退篇 (205)

“进步处便思退步，着手时先图放手。”进的时候要多点见闻，多些懵懂，退的时候要找好时机，留有余地。范蠡何以成陶朱？张良雪夜读《素书》。“六根清静方为稻，退步原来是向前”。曾国藩晚场善收，却谦称自己有“画蛇添足之嫌”。“弓不拉满，势不使尽”，曾国藩赞服范仲淹，对人生“进”“退”别有解读与体悟。

卷十一 事功篇 (233)

“他年我若为青帝，报与桃花一处开”。世人都想建立不世之功，而曾国藩却说：“身居乱世，富贵无所图，功名亦断难就。”王安石另有体悟：“豪华尽告成功后，逸乐安知与祸双”。虽然，曾国藩仍认为“天下事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。”

卷十二 世故篇 (253)

曾国藩说：“吾辈不必世故太深，天下惟世故深误国事耳。”《红楼梦》有“机关算尽太聪明，

反误了卿卿性命”的警世之语。世故太深，精明过度，均非载福之道。做事瞻前顾后，缩手缩脚，总不会有大的成就。曾国藩还说：你越精明，别人自当常以精明对付你。因此他一贯的品格是抱朴守拙。这正应了老子“含德之厚，比于赤子”，“我独泊兮其未兆，如婴儿之未孩”的处世观。

卷十三 意志篇 (273)

心如鼎镇，志如磐石。《论语》曰：空手与猛虎搏斗，徒步而涉深水，表面是勇气，内在是意志。曾国藩说，危难时可以验证平素之道力。祁门帅营，四面临敌，曾国藩帐悬长刀，言退一步即入地狱，弈围棋如故。梁启超说，功成业定后，人说苍天独厚曾国藩，实皮相之论，使其意志稍有摇动，他一定是一位大失败者。《抱朴子》将“坚志”称为“功名之主”，《呻吟语》说，“志不坚确，必无所成”。陶渊明园中自耕，史可法梅花伴骨，皆以意志为天下传诵。

卷十四 品格篇 (293)

“艰难困苦，玉汝于成”。品格是一个人能否立世的内在素养。《呻吟语》曰：财、色、名、位，此四字考人品之大节目也。曾国藩说：君子当以不如尧、舜、周公为忧，当以德不修、学不讲为忧。提升人格方能使人行为高尚，生活更有趣。曾国藩以“八德自勉”来造就品格。左宗棠傲物称诸葛，胡林翼仍批评他“小廉曲谨”。

卷十五 学养篇 (315)

司马光说：学者，所以求治心也，学虽多而心不治，安以学为？曾国藩说：学习是弘扬事业的载体，进德的极佳捷径，学业进一分，如家财增一分，德业长一分，日积月累，终成“巨富”。蒋介石说，曾国藩徒手搏天下，而士人影从，以学有根基，足以养业之故。毛泽东说，欲动天下之人，先动天下之心，曾文正得大本大源，故愚于近人，独服之。胡林翼修订《兵书要略》，曾国藩苦研《读通鉴论》，皆以经世之学入手，以根基雄厚立足。

卷十六 胸襟篇 (343)

襟怀宽广，能容天下之物。《呻吟语》曰：涵容是处人第一法，养心第一着。曾国藩说，喜怒形于色，“乃无涵养之力，是薄福之人，涵养冲虚，便是身世学问”。宋代名相吕端外似愚拙，然每临大事不糊涂。军机大臣张廷玉胸中有泾渭，处世圆通而浑厚，周瑜无量叹诸葛，夏言刚断恨严嵩。曾国藩取法圣贤，指腹为戏言：古今多少闲气，皆付一囊。

卷十七 机缘篇 (369)

《易经》曰：阴阳互动，顺厄可变。机缘者，时机、运气之统称。佛家讲因果，说善有善缘，恶有恶果。胡林翼说“一入官场，总是碰境”，他的才能名望本不在曾国藩之下，可惜死得太早，无缘享盛名。曾国藩抱定“可高可卑，可大可小”之念，平生“不信书，信运气”，并让他的心腹幕僚郭嵩焘将这两句话作为墓志铭，并自信“公之言”能流传后世。

卷十八 笃行篇 (391)

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”这是屈原的笃行。笃行者，执着如一地实践也。“天下事必须躬自入局”，日修身，夜慎独，学不止，死不畏，这是曾国藩的笃行。李鸿章说，我老师成功的原因很多，但不为浮言所动，执理甚明是重要一条。大禹治水惠天下，墨翟勤生亲操耜，皆以笃行而有成。不难看出：成功，先要有笃行，笃行先要有“笃心”。因此，曾国藩的治心经在此添上了浓重的一笔。

治心篇

释迦牟尼说：世间一切万物，“壮无过心”。所谓治心，也就是孟子所说的“苦其心志”“曾益其所不能”的功夫，是“天将降大任”前的首门功课。李鸿章说，我老师之有成，乃善治心也。蒋介石称“曾国藩治心之言，皆阅历之语”。毛泽东说，欲动天下者，先动天下之心。心无定旨，人如浮萍，终将无成。曾国藩积数十年之曲折，独创治心之法，先去其毒，阳毒为忿，阴恶为欲。又详述身心兼治、口体并防之十四个妙方。

治心篇（上）

【原文】

治心之道，先去其毒，阳恶曰忿，阴恶曰欲；治身之道，必防其患，刚恶曰暴，柔恶曰慢；治口之道，二者交惕，曰慎言语，曰节饮食。凡此数端，其药维何？礼以居敬，乐以导和。阳刚之恶，和以宜之；阴柔之恶，敬以持之；饮食之过，敬以检之；言语之过，和以敛之。敬极肃肃，和极雍雍，穆穆绵绵，斯为德容，容在于外，实根于内。动静交养，晬面盎背。

【译解】

治心的方法，应先除去心的毒害，外在的毒恶是忿怒，内在的毒恶是私欲。治身的方法，一定要防备身的恶患。刚烈的恶习是暴躁，柔懦的恶习是散漫。治口的方法，有二者要交互警惕，一是谨慎说话，二是节俭饮食。大凡这数种，用什么药来医治呢？以礼来居守恭敬，以乐来导致和顺。外表刚强的恶习，用和来调适它。内里柔懦的恶习，用敬来把持它。饮食的不节制，用敬来检束它。说话多的过失，用和来收敛它。敬达到完美而表现为肃肃，和达到完美而表现出雍雍。尊敬和睦，这才是有德的容貌，雍容表现在外表，实际根源于内心。动和静交互颐养，温雅润泽就见于面，盎于背，成为有德者的仪态。

【事典】

曾国藩的治心不是单纯的对心理欲求的限制，既包括心理活动，也包括行为规范，从范围上说，是治心、治身、治口浑然一体，既有表面的现象，也有发自内心的本源，他用阴阳来比喻。忿，就是愤激、愤怒、情绪化。曾国藩称他为“阳恶”，也即表现在语言行为上出口不逊，情绪难以控制。曾国藩非常赞同清人石成金在《谨身要法》中对忿激危害性的概括。石成金说：

七情所偏，惟怒尤甚。怒如教焚，制之在忍。非徒害人忤物，抑且愤事伤生。凡居官者，逞怒于刑，则酷而冤；发怒于事，则舛而乱；迁怒于人，则怨而叛。须要涵养其气质，广大其心胸。非理之触，心思明哲所容；无故之加，必虑祸机所伏。先事常思，情恕理遣。如此风恬浪静，非惟无患，且可养生。

曾国藩初入仕途，对宦海波折体会不深，而又自视过高，因而对这对那都看不惯，常有牢骚忿激之情绪。他的早期日记称为《过隙影》，这方面自我检讨的文字很多：

我会客时有一句话说得很欠检点！由于忿恨在心里扎根太深，所以有时一触即发了！饭后谈到了过去的小事情，我大发脾气，气愤的话脱口而出，有忘记了身分和亲情的情状。虽然经过了朋友的说服规劝，我还是肆意谩骂，那时绝没有什么禁忌害怕的。树堂昨天说：“心里的劣根没有除净，时间长了必定会爆发一次，而且一爆发就会不可收拾了。”我自己积下了这次火气，仅仅自我反省了凡次，其它的就只知道埋怨别人。本年立志重新做人，可是才过两天，就与我立下的志向决裂到这种程度！即使痛哭流涕，追悔不已，难道还有什么用吗？我真是像人们所说的与禽兽有什么两样呢！

率军打仗之初，这种愤激之情仍不时溢于言表。他强调忿激行为是一个人涵养不够、气量不足的原因，同时也与担当大事、

督己责人有很大关系。在给他弟弟曾国荃的信中说：

大概担当天下大事靠的是精神状态，积蓄郁结的多，也就倔强之至，也就不能不表现出一些愤激行动。以后我兄弟有动气的时候，彼此要互相劝说告诫，保存倔强，去除掉愤怒激动，这就行了。

曾国藩还用林则徐“制怒”的典故来自我教育。林则徐性格急切，遇有不平事常迁怒于人，为此常常适得其反。任江苏巡抚后，林则徐痛切意识到这一弱点，也深刻体悟到担当封疆大吏，如果不能自我克制，则贻误更大。因此，进驻巡抚衙门的第二天，就亲书“制怒”二字悬挂在听事堂，一是自我监督，二是让僚属监督他。“久之，人亦服其有雅量”，终成一代名臣。

忿激的进一步发展就是暴躁，忿激表面上是言语伤人，情绪窒人，但暴躁就不仅伤人，还伤害自己的身体。曾国藩说，暴躁最易伤脾、伤肝，对身体最有妨碍。所以他把“暴”称为治身的“阳刚之恶”。一次，隋观察来见，因该人办事能力弱，曾国藩勃然大怒，“词色大厉”。训斥完后，当天夜晚曾国藩在日记中自责，“退而悔之”。说自己“近来事有不如意，方寸郁塞殊甚”，常发脾气，足见“自己器量不容，治心之不深也。”

曾国藩进而认为，一个人常以和气悦人悦己，是吉祥福分的征兆，而如果常有乖戾之气，就会招致祸端。他曾多次为自己在家守丧期间的愤怒脾气而检讨，说因此才有曾国华之死。曾国藩平生自负甚高，正当国家多事之秋，他想大干一番时，清廷令他在家为父守丧。这使曾国藩心里很不是滋味。本来，父亲刚逝去，曾国藩应守孝道安心服丧，但在家守制的日子里，曾国藩脾气很坏，常常因为小事迁怒诸弟，一年之中和曾国荃、曾国华、曾国葆都有过口角。在三河镇战役中，曾国华遭遇不幸，这使曾国藩陷入深深的自责。在其后的家信中，屡次检讨自己有家期间的所作所为。如，在咸丰八年十一月十二日（1858年12月16日）的家信中写到，“去年在家，因小事而生嫌衅，实吾度量不宏，辞气不平，有以致之，实有愧于为长兄之道。千愧万悔，夫复何言！……去年我兄弟意见不和，今遭温弟之大变。和气致祥，乖气致

戾，果有明征。”咸丰八年（1858）十二月初三日，又提到，“吾去年在家，以小事急竟，所言皆锱铢细故。洎今思之，不值一笑。负我温弟，既愧对我祖我父，悔恨何极！当竭力作文数首，以赎余愆，求沅弟写石刻碑。……亦足少抒我心中抑郁悔恨之怀。”

守制期间，曾国藩忧心忡忡，遂导致失眠。朋友欧阳兆熊深知其病根所在，一方面为他荐医生诊治失眠，另一方面为他开了一个治心病的药方，“歧、黄可医身病，黄、老可医心病。”欧阳兆熊借用黄、老来讽劝曾国藩，暗喻他过去的做法，未免有失偏颇。

治口就是慎言语，即不议人短长，曾国藩遵循的尤其是不背后议论人。中国有“祸从口出”这句话，曾国藩加以发挥，在给弟弟的信中说：

天下事变化很多，变化的道理更深不可察。人情难知，天道更难测，别处的事情不要毫无忌惮的大加议论。孔子说“多闻阙疑，慎言其余”，弟的听闻本来不多，多疑则全不阙，言则更不慎。捕风捉影，扣盘扞烛，就要硬断天下之事。天下的事情果真就这样容易了断吗？

对曾国荃自视过高的缺点曾国藩作为兄长猛加敲打。一次曾国荃读唐代文章，断定文中的某某是小人，某某是君子。曾国藩不以为然，他认为是非都有适用的范围，这样轻易下结论是阅历不深、视天下后世太轻的缘故，于是去信说：

文章一篇，就能让天下人、后世之人都知道某某是小人等等，未免把文章看得太重，而把天下与后世都看得太轻了。这间屋里所谈论的是非，换一间屋子可能他就不以为然，换一个地方则说法更要发生变化。这乡人所推服的贤士，换一乡则不认为是贤士，如果换到另一府去，就会多次发生变化而不是一次变化。何况天下呢？何况后世呢？

其实，曾国藩自己早年也有评头品足、议人长短的毛病。他的好友陈作梅对他说：“见得天下皆是坏人，不如见得天下皆是好

人，存一番薰陶玉成之心，使人乐于为善。”曾国藩的日记中说：陈的话是“讽余近日好言人之短，见得人多不是也。”

由于“口祸”招致他人忌恨，曾国藩在守丧期间进行了深刻的检讨。事实上，自率湘军东征以来，曾国藩有胜有败，四处碰壁，究其原因，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。同时，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也有很多弱点，在为人处事方面固执己见，自命不凡，一味蛮干。后来，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，谈到了由于改变了处世的方法而引带的收获，“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。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，可屈可伸，可行可藏，又每见得人家不是。自从了已、戊午大悔大悟之后，乃知自己全无本领，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。故自戊午至今九载，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，以不怨不尤为用。立者，发奋自强，站得住也；达者，办事圆融，行得通也。”在一年以后，再次出山，曾国藩则变得善于应酬，左右逢源，他自己承认，“余此次再出，已满十个月。论寸心之沉毅愤发志在平贼，尚不如前次之志；至于应酬周到，有信必复，公牍必于本日完毕，则远胜于前。”以前，曾国藩对官场的逢迎、谄媚及腐败十分厌恶，不愿为伍，为此所到之处，常与人发生矛盾，从而受到排挤，经常成为舆论讽喻的中心，对于这种情况，有人说道：“国藩从官有年，饱历京洛风尘，达官贵人，优容养望，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气，盖已稔知之。而惯尝积不能平，乃变而为慷慨激烈，轩爽肮脏之一途，思欲稍易三、四十年不白不黑、不痛不痒、牢不可破之习，而矫枉过正，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，以是屡蹈愆尤，丛讥取戾。”但是曾国藩经过深刻的心理反思和多年的实践，非常真切地意识到，仅凭他一人的力量，是无法扭转官场这种状况的，如若继续为官，那么唯一的途径，就是去学习、去适应。“吾往年在官，与官场中落落不合，几至到处荆榛。此次改弦易辙，稍觉相安。”此一改变，说明曾国藩在宦海沉浮中，日趋精明及旷达了。

以“治心”为题解析曾国藩注重精神修养、提升品格的人有很多，如李鸿章、梁启超、蒋介石等人。蒋介石终生研究曾国藩。本世纪二十年代，他在研读曾国藩、胡林翼的各种文集、遗集后，有感于“其苦心毅力”“足为吾人之师资”，准备围绕“治心”的

内容，“摘其言行，可以为后世圭臬者，成为一书”，以作为黄埔军校的教材。但名将蔡锷先行一步，已编成《曾胡治兵语录》，并由同样崇拜曾国藩的梁启超作序，于1917年在上海发行。蒋介石对蔡锷所编的书表示满意，但觉得缺少了最重要的一部分，即曾国藩“苦心毅力”得以成功的内容缺焉不详。在蒋介石看来，这等于没有挖掘源头，于是“择曾胡治心之语之切要者，另列一目”，认为这样就“可为后世法”。蒋介石一再谦恭，说自己不敢“擅改昔贤之遗集”，但由于曾国藩文集“皆经世阅历之言”，而且都是他“所欲言而未能言之者”，所以战战兢兢，编成完书，认为其治心经“不惟统兵者之至宝，实为治心治国者之良规。愿本校同志，人各一篇，则将来治军治国，均有所本矣。”当时作为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，如此重视曾国藩治心成功，当然有他的目的。该书作为黄埔军校的教材，影响了现代许多政治家、军事家。据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回忆，蒋介石增补的《治心篇》在许多报刊上连载，可见影响之一斑。

治心篇（中）

【原文】

肝气发时，不惟不和平，并不恐惧，确有此境。不特弟之盛年为然，即余渐衰老，亦常有勃不可遏之候。但强自禁制，降伏此心，释氏所谓降龙伏虎。龙即相火也，虎即肝气也。多少英雄豪杰打此两关不过，亦不仅余与弟为然。要在稍稍遏抑，不令过炽。降龙以养水，伏虎以养火。古圣所谓窒欲，即降龙也；所谓惩忿，即伏虎也。释儒之道不同，而其节制血气，未尝不同，总不使吾之嗜欲，戕害吾之躯命而已。

【译解】

肝火上升时，不只是不平和，也不恐惧，确实是这种意境。不只是弟弟年轻气盛是这样，即使我渐渐老了，也经常有怒不可遏的时候。但是要强迫控制自己，降服自己的心，这就是佛教所谓的降龙伏虎。龙就是相火，虎就是肝火。多少英雄豪杰都过不了这两关，也不仅仅是我和弟弟这样。主要是要稍稍控制，不要让肝火过分高涨。降住龙用来养水，伏虎用来养火。古人所说的止息欲望，就是降龙；所说的惩忿，就是伏虎。佛家、儒家方法不一样，但节制血气，没有不同，总是要不让自己的欲望残害自己的身体寿命。